



中国的改革 能继续 下去吗？

ZHONGGUO
DEGAIGENENG
JIXUXIAOUMA

3.9

—从外部看中国》译丛

〔美〕逐怀特·H·伯金斯
俞晓秋 尹钢铁 译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蓝眼睛——从外部看中国》译丛

中国的改革能继续下去吗？

（原书名：中国，亚洲的下一个经济巨人）

〔美〕德怀特·H·伯金斯 著

俞晓秋 尹铁钢 译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北京北新桥三条4号
（邮政编码 100007）

经销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北京隆昌印刷厂

开 本 787×960毫米 32开本

字 数 80千字 4.875印张

版 次 1989年8月第1版

印 次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074—104—4/D·04

定 价 2.00元

顾问名单 (按姓氏笔划为序)

向 青
许俊基
陈鼓应
赵宝煦

金冲及
金春明
翟泰丰

编委名单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 平
朱 军
王浦劬
田 野
许宝友
刘长梅
刘得喜
冷 溶

沈 培
张平晔
祖 卫
曾 胡
龚 莉
俞晓秋
谢春涛

主 编 冷 溶 王浦劬

副主编 许宝友 曾 胡

中文版序言

这本书是在4年前撰写的。从那以后的3年（1986—1988）里，中国经济取得了更为迅速的发展，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年均10%的增长率。然而，这种高增长率使随之带来的一些经济问题的状况日益恶化了。最明显的是，在这段时间里，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

毫无疑问，经济与政治方面的原因将会使1989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放慢。90年代中国经济将会发生什么情况还有待观察，这里不想对此进行预测。但是，在我看来，从这本书出版以来，决定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快慢的基本因素依然没有什么变化。

这本书的中心论点是，50年代在东亚其他国家与地区开始和80年代在中国出现的那种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归结为这样3个方面：第一，那里受过教育的人们具有自我组织从事复杂工作的经验和才能；第二，这些国家和地区推行了一些有利于经济迅速增长的政策。其中，有两项政策对于东亚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来说是至为关键的，即强调发展以制成品出口为基础的对外贸易和缩小收入不均的差距。最后，这些国家与地区有一个有助于国家和私人长期

投资以及努力提高投资效益的稳定的政治环境。

象东亚其他国家与地区一样，中国拥有取得经济迅速增长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在80年代，中国成功地推行了“外向型”的对外经济政策，同时也具有一个有助于对提高工业和农业的生产能力采用不同方式进行尝试的政治环境。然而，90年代的环境是否同样有助于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和转型，这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德怀特·H·伯金斯

1986年7月于哈佛大学

译者序

10年改革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然而今天，改革的进一步深入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中国的改革能继续下去吗？

它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改革究竟能否最终获得成功？

这是当前国内外舆论所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正是出于对改革命运的深切关注，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将这本书译了出来，期望它能对认识与理解改革所面临的那些主要问题有所启发。我们觉得，在阅读正文之前，先就作者和本书的主要内容论点做一个简要的介绍，然后再谈谈我们的一些看法，这也许对理解本书中的一些重要观点是会有帮助的。

作者德怀特·H·伯金斯，生于1934年10月，1956年在康奈尔大学获学士学位，1961、1964年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60年代后期在哈佛大学提升为经济学教授，并任经济系主任。他还担任过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的副主任、纽约市立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常务理事等，现为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同时任华盛顿大学“H.M.杰克逊现代中国研究”的客座教授。他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并以东亚地区作为研究的重点，是美国对东亚和中国问题研究的知名学者之一。他撰写和编辑的著作

有：《1368—1968年的中国农业发展》（1969年）、《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现代经济》（1975年）、《中国农村的发展》、《共产主义中国的市场控制与中央计划》（1966年）、《发展经济学》（1983年）、《南朝鲜的经济现代化》（1980年）等。我们翻译的这本书《中国：亚洲的下一个经济巨人？》，（1986年）是他的有关中国改革问题的一本近作，此外，他还写过不少文章、评论，对中国的改革与现代化问题提出了不少精辟独到的见解，值得人们一读。

从东亚地区的发展经验来探讨中国的改革，是这本书的独到之处

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在论述中国经济改革时，常习惯于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经济制度和东西方经济体制差异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研究，而伯金斯教授则从东亚国家及地区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改革。在他看来，无论在人种区域关系，还是在历史文化背景方面，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应与东亚国家及地区的经济成长过程有着更多的相似性。

他认为，战后东亚地区（主要指日本和“四小龙”）经济迅速增长的原因，应主要归之于这样几个因素：

一、良好稳定的政治环境。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和地区自二次大战之后没有发生重大的社会动

乱，有一个稳定的、以推动经济增长为优先目标的政府，以及政府与企业之间良好的指导合作关系（香港和新加坡除外）。在书中他指出，“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在社全安全得不到保障的环境下，不论是国家投资还是私人投资，其经济都是不可能取得持续增长的。因此，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关键的问题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是否能支持和鼓励长期性的投资。”

二、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他说：“经济增长不外乎有两个原因：一是生产投入的增加，即主要是资本和劳动力的增加；二是这些投入的产出率的增加。东亚国家及地区50年代至70年代经济以年均9—10%的速度增长的一半原因，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他认为，东亚地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主要是，良好的文化教育传统，历史上形成的管理城市商业供给的经验，不同程度数量的“美援”和引进大量的先进技术与设备，以及企业生产管理的大大改善。

三、“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这种战略是导致日本和“四小龙”经济发展成功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他认为，“外向型经济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对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有着很大的影响，同时，通过增加出口换取外汇来购买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和进口国内重要产业部门所紧缺的原材料。”“它使得东亚国家及地区的经济与国际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另一方面，“开放型”经济促使大量的外国直接资本投资的流入，也是促使经济迅速增长的重要因素，当然，在引进外资的做法上，它们是谨慎小心和有差别的。

四、成功的土地改革政策和低水平的收入不均。土地改革的成功推动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并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资金和原料，同时使农村走上了工业化的发展途径。低水平的收入不均没有造成重大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促进了政治的稳定，使绝大多数人都能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和收益。更重要的是，他指出，在东亚国家及地区有这样一种自由的环境，即“在取得经济成功方面，每一个人都有得到自我发展的机会和可能。”

正是上述这些因素，使得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几乎同一时期起步的拉丁美洲和非洲。

二

改革之前阻碍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政治不稳定和动乱、劳动生产率低、以及中央计划体制的弊病。

从东亚地区的发展经验来看，伯金斯指出，在人力资源、政治稳定和文化教育背景方面，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非常相似，而它们之间的差别则主要有这样四个方面：

第一，是近代历史发展上的差别。与日本相

比，中国经济发展起步晚与近百年的内乱外患、近代化没有得到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

第二，是中国的国度。中国是一个大国，幅原辽阔；人口众多，东西南北发展的不平衡，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很大，而外贸所占的比重则远远低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

第三，是中国的经济体制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它的工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苏联式的中央计划体制下发展起来的。”

第四，是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战略及其经验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由于特殊的国际环境，1949年革命胜利之后，中国沿用了苏联的发展模式，并从苏联获得了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援助。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中国更加强调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实现这个经济发展目标的方法是自力更生。

伯金斯认为，1949—1976年中国经济增长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的主要原因，是“从1958—1976年这一时期，影响投资和建设的环境一直处于动乱之中。”在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缓慢与劳动生产率没有很大提高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劳动生产率没有很大提高的关键性原因，是经济体制的问题。

由于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上的问题，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以消耗大量投资与能源为代价的，这种低效率的发展方式严重地阻碍了经济迅速持续地增长，同时，过高的资金积累率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很大的提高。此外，对经济的行政控制与指

挥以及计划中的失误，使得企业无法根据社会的实际需求变化进行生产，其结果是，一方面，商品短缺现象依然十分严重，另一方面，造成了供过于求的产品大量积压，库存量极为庞大。

伯金斯认为，出现这种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低效益和严重浪费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式中央计划体制。他说：“苏联经济在70—80年代所面临的困境表明，中国在采用指令性计划体制中所遇到的困难不是偶然的，此乃是这个体制本身所固有的弊病造成的。”因此，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然的。

1976年以后的改革，大大提高了工业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使过去年均不到5%（按70年代的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提高到年均8%多一点的增长水平。其中，农业改革的成效是最为明显的，它使中国农业产量从1977年至1984年连年大幅度增长。其次是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大量的外国资金和技术，建立了经济特区，扩大了中国的对外贸易，调整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及其发展方式，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加强了与国际经济的联系。另一方面，市场因素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正在发生逐渐的转变。

三

当前改革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通货膨胀、贪

污腐败和贫富不均。

伯金斯在书中写道：“改革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过程，经济体制中的一个环节的重大变化必然要对其他的环节产生影响。……没有进一步的改革，经济也许仍会继续增长，而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倒有可能会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例如，在许多方面的改革，南斯拉夫和匈牙利都超过了中国，但是没有人会认为，这两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6—8%的年均增长速度会持续10年或者更久。”

他指出，“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过高的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贪污腐败和急剧扩大的贫富差距。”

“1985年的通货膨胀已在中国的城市居民中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不满。……就目前来说，即使通货膨胀率的上升是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引起的，中国老百姓对于物价上涨的承受能力也是很有限的。”“因此，旧体制中的价格问题和改革之后人们收入的大量增加是引起通货膨胀不断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改革初期出现通货膨胀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但“问题是通货膨胀出现后还会发生什么情况？”

“贪污腐败和贫富不均是相互关联的，对改革的前途很可能有着更大的潜在威胁。”“经济上的不平等也许会反过来造成政治上的紧张冲突，从而最终破坏或阻挠改革的成果与进程。”而“贪污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央计划和依靠全面

的行政手段来控制经济的体制所造成的。”因为“在人们看来，在中国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里，没有政治上的权力就谈不上经济上的致富。不论是在完全社会化的城市，或是在集体化的农村、经济权力大多是掌握在那些拥有政治权力的人手中的。”因此，“日益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也将会对改革造成极大的危害。

更重要的是，他进一步指出：“在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危险也许不是通货膨胀和贪污腐败，而是改革过程的复杂性。这样复杂性意味着，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失误，而任何的失误都将会造成经济的衰退，经济的衰退则会削弱政治和舆论对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支持。”

那么，为什么改革的过程会如此复杂呢？其原因就在于，改革是一个从中央计划和对生产资料实行行政调拨为主的经济体制走向一个让市场机制起更大作用的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有几个关键性的和相互关联的步骤，而其中只要有一步走错，就将会影响其他的几个步骤以及改革的全局。由于目前中国的经济体制“是一个以苏联式中央计划为主与市场社会主义因素相混合的不那么令人满意的東西。因此，管理这样一个复杂的经济体制难免会有失误，而要是失误很严重的话，那就会使改革受挫。”改革失误或改革受挫的直接结果，便是经济领域出现混乱、增长率下降，其造成的影响远远要大于经济领域本身。

因此，伯金斯说：“是什么原因会使一个今天积极主张改革的人到了明天，却得出结论认为改革已经失败了呢？最明显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改革没能使经济得到持续的增长。”

四

企业的自主权、健全的市场机制、有效的宏观控制和大力发展农业，是推动改革继续深入发展的重要途径。

伯金斯认为，要推动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应当采取这样几个方面的步骤：

第一，是要让企业拥有真正的自主权，并使企业按市场法则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当然，产品的价格必须反映其稀缺程度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是简单地放开价格任由市场决定，则会导致市场和资源配置的极大混乱。

第二，是对经济必须实行有效的宏观控制。通货膨胀率的急剧上升会对政治产生不利的影响，同时也会对经济造成危害，因此，必须作出更大的努力来控制通货膨胀。同时，“中央计划和对一些重要投资项目的行政控制还不能一下子全部放开，尤其是不能放开对外汇的管制，不能让企业就象用人民币购买别的东西那样，随意地购买外国产品。”

第三，是应当重视农业问题。从中国的国情和从1979—1984年粮食产量连年上升到1985年后粮食产量逐年下降的变化中，“中国领导人应当重新对

促进农业长期发展的问题有一个更为明确的认识。中国必须在农业方面投入足够的资金来保证农业生产能够满足国内的基本需求。”

除上面的几点之外，中国还必须找到解决能源、交通这类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的办法；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再也不能继续浪费现有的科技人才；努力解决人口增长过快、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多的出路问题。

五

中国从事改革的势头是无法扭转和难以阻遏的。

在论述中国改革的未来前景时，伯金斯指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都是决心进行改革的，”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的改革政策不会有很大的变化，中国的经济也不可能重新回到50—60年代。”“中国的改革本身已产生了一种难以扭转的动力，”虽然“存在着某些障碍因素，但中国从事进一步改革的势头是无法阻遏的。”他说：“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如何，主要取决于中国能否从中央计划的经济转变为一个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具有多种间接调节方式的指导性的经济，以及未来的中国领导人是否会继续鼓励和支持这种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工业领域的改革成效比农业领域的成就要小得多。他认为，“中国城市改革究竟走了多远，以及将来可能会走多远，这是中国整个

经济改革的关键问题”。因为从目前的情况看，到2000年及以后，中国经济的主导力量仍将会是那些国营企业。因此，如果改革对国营企业起不了多大作用的话，那么，改革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就将会是很有限的。”

尽管“中国在用新的管理体制和方法改造国营企业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实验”，但是，“50—60年代形成的苏联式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依然没有受到很大的触动”。而“如果受指令性计划控制的工业产品在今后会逐渐减少，并有相当一部分可以在市场上买得到的话，那么，中国就在向市场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价格改革的主要问题是，“为了使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价格改革是否会走得很远？”迄今为止，“在工业领域中，市场机制充其量只起着很小的作用，而且现在要迅速地扩大它的调节范围和作用，所遇到的困难可能要比农业领域大得多。”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而言，其中“存在着许多含糊之处，改革的具体目标并不明确，这给改革带来了很大的难度。”而且“中国领导人在使工业领域朝着市场调节的方向究竟能走多远，目前尚不清楚。”看来，“在城市和工业领域中，要使市场力量逐渐占据主导作用的改革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关键的一点是，从现在到21世纪初，“经济领域的变革将会促使中国彻底摒弃苏联式的中央计划

体制模式呢，抑或是，改革的结果仍将会保留苏联式中央计划体制的关键部分，尽管这些部分经过了1976年以后改革的修饰？”“对于这个问题，没有一个人能够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而且，即使是坚决主张改革的领导人，也不知道改革应当走多远。”

对于改革是否会走回头路以及改革能否继续下去，他指出，“今后二三十年里，中国国内的政治环境是否会继续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和推行以增长为目标的经济政策。”不只是一个未来的权力交接、政策延续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涉及到如经济改革本身所产生的力量能否继续成为推动改革进一步深入发展的动力，或是反过来成为损害现已取得的成就并阻碍改革进一步发展的因素等一系列问题。”

六

我们认为，改革需要新的思路。

如果说，10年改革是对过去30年历史反思的结果，那么今天，我们也应当对10年改革历程进行反思。为什么我们的改革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之后接着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问题的关键究竟在哪里？我们觉得，一方面是由于改革过程的复杂性。改革决非是易如反掌之事，也不是玩“魔术”，一夜之间便能创造出一个奇迹来。另一方面是由于对自己的国情认识不够，对改革的总体目标缺乏一个完整明确的设想，没